

[品三国]

商议

盛巽昌 著

李伟国

时下讲史之风盛行。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各地强势媒体，纷纷加入；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毛佩琦，各种学术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种图书，交相辉映。《品三国》



俨然成为超级畅销书。

精英讲史，大众听史，全民读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精神矿藏，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需要对历史的观照，反思和汲取。在世界几大文明相互砥砺激荡之时，也需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以重建中华文化体系，立足于世界主流文化之林，嘉惠兄弟民族，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品三国]

商议

盛巽昌 著

讲史、品史者之短长及其匡正
李伟国

时下讲史之风盛行。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各地强势媒体，纷纷加入；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毛佩琦，各种学术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种图书，交相辉映。《品三国》



俨然成为超级畅销书。

精英讲史，大众听史，全民读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精神矿藏，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需要对历史的观照、反思和汲取。在世界几大文明相互砥砺激荡之时，也需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以重建中华文化体系，立足于世界主流文化之林，嘉惠兄弟民族，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品三国》商议/盛巽昌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249 - 7

I. 品... II. 盛... III. ①《三国演义》评论-②中国-古代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I207.413 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110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杨德鸿

《品三国》商议

盛巽昌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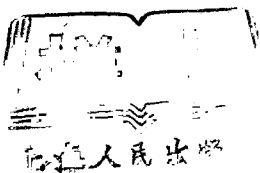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324,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500

ISBN 978 - 7 - 208 - 07249 - 7/K · 1366

定价 27.00 元



讲史、品史者之短长及其匡正

李伟国

时下讲史之风盛行。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各地强势媒体,纷纷加入;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毛佩琦,各种学术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种图书,交相辉映。《品三国》俨然成为超级畅销书。

精英讲史,大众听史,全民读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精神矿藏,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需要对历史的观照、反思和汲取。在世界几大文明相互砥砺激荡之时,也需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以重建中华文化体系,立足于世界主流文化之林,嘉惠兄弟民族,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众多的讲史者、品史者乃至侃史者,有的是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史学家,有的是中国历史的热烈爱好者,有的是原本从事其他领域教学和研究的“闯入者”,他们从学经历的不同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及讲史方式的各不相同,形成了多元风格和特色,百花齐放,丰富多彩,但瑕疵亦与生俱来。

纯粹的历史学家或因恪守史实而失之于拘谨,严谨有余活泼不足,读者寥寥,不足以形成热潮。但有古典文学或文学创作经历和学术背景的人,以“闯入者”的姿态进入历史领域,比较放得开,讲述活泼生动,听者、读者入迷,既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但又容易在“无意中”暴露史学修养的不足。

易中天先生说:“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妙说’。所谓‘妙说’,就是文学其表,历史其里,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其宗旨美则美矣,然而要做到既有华丽的文学形式,又能准确地讲述史实





及其规律，难度是很高的。

二

其实，在此次讲史热潮之前，通俗的、类似于讲史的著作已有不少。其中亦不乏上乘之作，如《上下五千年》、《中国历代史话》、《黎东方讲史》等等，即曾长期畅销，拥有成千上百万的读者。然而时代不同，由于那时没有电视台这样的强势媒体介入，也就无福享受如今日易中天先生这样的人尽皆知的荣耀。

被公认为历史学家之信史而又能够以生动活泼的讲史文学形式吸引听众和读者的，不能不提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黎先生受业于中法名家梁启超先生和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于重庆面向公众讲述三国史，获得巨大成功，进而讲述其他各朝史，并在胡适的鼓励下，陆续写出了“细说体”讲史著作。

《黎东方讲史》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已故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曾热情洋溢地为黎东方讲史作序，邓先生以《细说三国》为例说，黎先生所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他广泛阅读三国史料和古今学者的有关学术著作，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三国志》就有被斩、下狱物故和畏罪逃亡三种不同的说法，黎先生详作分析，倾向于第一说，但又希望其他专家或后起之秀来最终了结这桩公案。黎先生还时时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其可贵的是，黎先生在维护正史的基础上，还能指出野史有时也有可信之处。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入书中，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细说三国》对于难度较大的官制和地理沿革等，亦大费功力，认真考订，乃得其实。

邓先生还指出，黎先生的《细说》是深入浅出，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他的讲史，全都是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黎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拼凑而得来的，所以才能这样的左右逢源，曲汇旁通。邓先生举例说，《细说元朝》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能体会到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以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和《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对读者都是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新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邓先生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的确，黎东方讲史既对史实的考求，极下功夫，于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亦常能根据需要细加阐述，又能融史识于其中，洞悉历史的规律，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注意解答历史之谜和民间传说，并放弃了“编、章、节”的论述式结构，而以一个一个并列的话题一路铺展的方式抓住听众，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讲述。可以说，黎东方讲史是“史”、“识”、“趣”的较好结合。

三

以“史”、“识”、“趣”结合的要求品读时下诸公之讲史，则其短长颇有可议者。





学者、老友盛巽昌，文史专家，著述甚富，而其近年的兴趣焦点，则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史，已经和即将出版的相关著作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用功最深的，当推刚刚面世的《三国演义补证本》。若论更合潮流，因而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则又当推《〈品三国〉商议》。

《三国演义》，古人著作，还有什么可以用力的？不然。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主要脱胎于《三国志》，作为一部由讲史而来的文学作品，又允许其不同于《三国志》。但是盛巽昌先生认为，文学创造和虚构固然是可以的，误用和歪曲则是不可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使用更准确的资料，一点也不会影响《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许还能增强其彩色，于是就有了通过长时间收集、比对、梳理、考证而得到的一项大成果《三国演义补证本》，以历史的眼光，运用大量史料，逐回逐段地过滤《三国演义》一书，从而沟通文史，辨析虚实，写下了1000余条“补证”文字，每一条都是一篇内容扎实、饶有兴味的短文。

有扎扎实实的《三国演义补证本》为底子，再来审视当下讲三国史者之准确与否，自是驾轻就熟，且常能鞭辟入里。特别是如有有意无意地将《三国演义》的移植、发明和文学演绎掺杂进历史的做法，盛公一眼就能看出。

近年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行世，出了大名，事涉当行，老盛技痒难熬，写出了《〈品三国〉商议》一稿，原共提出150多个问题，其中上册的问题，除前已成书的48条以外，又发现20多条，下册则有80多条，成书时筛选出130多条，已发表的亦作了修改和订正。《品三国》上下册共四部48集，盛先生提出商榷和议论补充的问题，平均每集有近3个。在我看来，老盛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精心撰写的考证，大部分是令人信服的。有些问题看似细小，其所补材料、所作考证，于学术研究、于通俗讲史，亦应有所补益。有些问题，从斜刺里切入，有叫人防不胜防之感，其“鸡蛋里挑骨头”之论，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易先生本无差错，盛先生指出在学术界另有一说，特补证于此，也颇有趣味。承盛公慨予先睹为快，今仅就史实、官制、地理及若干特殊文句的理解等数端，结合笔者的

查证和看法，并与《黎东方讲史》作比较，试析如次。

四

盛先生指出易氏在史实方面出现的疏失较多，现略举数例。

易氏说董卓进京，是氏族袁绍请进来的。大家都知道董卓是被何进招来的，袁绍只是在商议时出过主意而已，而且比较详细地描述袁绍所出的这一特大馊主意的，乃是《三国演义》，但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最后拍板让董卓进京的仍是何进，故易氏说董卓是由袁绍请进来的，难以服人。

易先生说，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就带兵和黄巾军作战，“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个时候，曹操的军事力量是不如黄巾军的。黄巾军有战士三十万，加上随军人员共一百万，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举军皆惧’”。以上千人对敌三十万人，有点匪夷所思，但易先生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呀。还是翻出原文看一看吧：“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这是战前的察看地形，较大规模的侦察行动啊，想不到被黄巾军发现了，发生了一场战斗，“死者数百人”，那回来也只有数百人了。很显然，“举军皆惧”的“举军”决不会只有这数百人。盛先生推算，那时曹操的军队大概已拥有几万人。

易中天说，袁绍战败，陈琳被俘，曹操责怪陈琳在为袁绍写的檄文中骂祖宗三代，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易氏还说这事记载在《三国志·陈琳传》正文，不是野史，应该可信。但《三国志·陈琳传》是没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八个字的，最早记载类似的话的，是《萧氏后汉书》、《郝氏后汉书》和北齐魏收的《魏书》，作“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或“矢在弦上，不可不发”，这些书后世已佚，在北宋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引用，《三国演义》用了这句话，而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想，如果易中天先生查究一下其中的原委，以此为素材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听众也会很感





兴趣的。类似的例子还有“青梅煮酒”，易氏以之与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并列作为三国时代的重要史事，但实际上这也是《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曹操确实请刘备吃饭，但没有“青梅煮酒”。“青梅煮酒”一词最早见之于北宋词人晏殊的《诉衷情》词，“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后人在文学作品里多袭用之。再说曹操请刘备吃饭，乃是夏六月，已非青梅煮酒时节，当然作为文学作品，也不必深责。

易先生《品三国》的一大特点，是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着墨最多，而且处处褒奖有加，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时候为此而将不同的时空拉到了一起，就有所不妥了。易先生说：“实际上，就在曹操军民官兵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士兵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连桑葚和河蚌都没有吃的就吃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他们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可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等史料，袁绍的士兵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的时间，是在曹操屯田之前，其时曹操的部队也缺粮。正有鉴于此，曹操才定下了屯田之策。况且在曹操屯田有所收获以后，袁绍所据有的冀州仍称“带田百万，谷支十年”。

易先生在《品三国》上册里先是说关羽爱上了一个女人，结果被曹操留下了，后来又讲，曹操抢走了关羽的老婆。根据各种史料，事实是关羽曾经看中一位女子，希望让她留下来作为自己的妻子，却不敢就收为己有，而是多次向曹操报告了这件事，曹操却先找了那个女子，因为那女子长得很漂亮，曹操就收下了。所以这个女子不是关羽的妻子，故不存在曹操抢走关羽的老婆这回事。不过这件事情，曹操的确是做得很不地道的。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的“吕布”篇里生动准确地讲述了这件事。

黎东方先生很注意这个问题，他在《细说三国》的“赤壁”一篇中说：“《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

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这种态度就对了。

五

《品三国》中涉及官制方面的问题也不少。

在《品三国》上册中，易先生说舒仲应是袁术的“丞相”。确实，袁术自命不凡，急于称帝，打出“仲家”皇帝的旗号，旋成众矢之的，两年后为曹操所破病死。他的短命王朝有没有封过丞相，谁也未曾考信过。现在易先生品出了一位袁术的“丞相”，所据何史？有关舒仲应的记载仅出自《后汉书·袁术传》：“术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其事迹颇为感人，但说到袁术的“丞相”，原来只是“为术沛相”四字。按“沛相”即沛国相，是袁术派往沛这个封国的行政长官，职责、权位与郡太守相同，与所设丞相全然不是一回事。

易先生说，建安元年，曹操认为条件成熟，便派他的堂弟、“扬武将军”曹洪去洛阳迎奉汉献帝。可是事实是曹洪从来没有做过“扬武将军”，当时只是“扬武中郎将”，中郎将的职位比将军低。曹操自己在同年稍后时才被封为“建德将军”、“镇东将军”，曹洪是不可能在他的主子前前任“扬武将军”的。

易氏说：“潘濬本是刘备的人，在刘备手下做一个小官，关羽被杀后跟了孙权。”但历史记载是，“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治中从事是州牧的第一副手，当时一个州有六七个郡，相当于现代的省，州牧为地方大员，其主要副手难道可以说小官吗？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的“益州易手”一篇中解释张松的官名时说，“益州别驾”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治中’与别驾不同，专管对内，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易氏又说大学者虞翻“只在东吴做小官”。虞翻当时的官职是





“骑都尉”，主职统率皇宫警卫军的羽林骑士，是个不小的官，何况那个时候，若论官名，未称王称帝的孙权还只是个杂牌的讨虏将军，他所委任的主要官员，头衔都不大。

黎东方讲史在涉及包括职官制度在内的典章制度问题时，常能娓娓而谈，曲尽其奥，如在其讲三国的《司马懿》一篇中，说到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黄初二年升调司马懿的官为“侍中、尚书右仆射”，接着黎东方先生详细地阐释了侍中和尚书是什么官，尚书令、尚书仆射又是什么官，从汉初至三国魏有什么变化。讲得清清楚楚。对于治史的钥匙之一的职官问题，自是黎东方这样的历史学家素所留意，而要求易中天先生同样的重视，就有点苛求了。

六

地理沿革，是史家治史时的一个大问题。

《品三国》在介绍东吴大将陆逊的时候说道：“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这个解释看似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今天的苏州市，只是东汉三国时期吴县的一部分，而陆逊等江东陆氏宗族，世居本非此处，他们是吴人，却不是苏州人。陆逊乃是吴之华亭人，也就是今上海市松江人，《辞海》（1999年版）就是这样表述的。其实，在孙权时期，陆逊所封的华亭侯、娄侯，就是以他的家乡为封邑的。

又如天行健先生在其《清算品三国》一书指出，易中天先生在讲述著名的官渡之战的时候说，“袁绍结集了十万精锐部队，向许昌方向挺进，而曹操的军队也在两个月前驻扎官渡”，然而官渡之战时，还没有许昌这个地名。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春秋时为许国，秦改置县，即许县。建安元年，曹操逢迎汉献帝定都于此，所以称为许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洛阳为首都，改许县为许昌，寓“因许而昌”之意。因此，说公元199—200年之间，袁绍的军队“向许昌方向挺进”，是不够严谨的。

黎东方先生对地理沿革问题十分重视，他在讲史时遇到此类问题决不绕过，一定不厌其烦，原原本本地解析清楚，而且即使是

此类解说，也可以使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比如他说到曹操败走华容道，就说，“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进而又说，“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关于扬州刺史的解释，更为详尽。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则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

黎先生在介绍诸葛亮的籍贯的时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了曲折复杂的关系，使每一位听讲的人和后来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更是厘清地理沿革的典范。黎先生是这样说的：

诸葛亮究竟是哪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若论他的出生地，则是琅邪郡阳都县，在今日山东沂南。他的近代祖先，是山东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处，喜欢自称“诸葛”。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葛国的国君。“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隆中在襄阳啊。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南阳太近，而且，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当然，当时的南阳郡是属于荆州的，而荆州肯定是湖北人的骄傲。汉朝南阳郡邓县故城一名“隆中”，南阳和邓县现在是河南人骄傲，但当时的邓县故城又不在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之西。最后，黎先生说：“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太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家声称荷马是他们的国民么？”

易中天先生在介绍诸葛亮的家世的时候，提到“隆中”，大体采用黎东方先生的说法，但他又讲了一个清代的笑话，引出了天行健先生的一番议论。





七

《三国志》裴注引《江表传》及《续后汉书》等史料叙述孙策、周瑜纳大桥、小桥，“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其中之“二女虽流离”，易先生品为“大乔小乔虽然颠沛流离”，盛先生指出此“流离”乃“光彩焕发貌”，缪钺先生的《三国志选注》正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流离”之一义为一种宝石，转为光彩纷繁之貌，汉杨雄《甘泉赋》：“曳红彩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宛延。”天行健先生认为“流离”还有一解就是淋漓，水下滴的样子，在这里是形容女人的漂亮，水灵灵的水汪汪的，娇媚欲滴的样子。也是一种不错的说解。孙策的那番话，意思是“桥公的这两个女儿虽然长得漂亮，但能嫁给我们两个人，应该可以很高兴、很满足了”，言下之意，两位小姐不要太骄傲，我们两个男子可不比你们差！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又如《后汉书》说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品三国》下册解释说，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盛先生指出，这里的“儿”本作孺子、男儿解，引申出去，还可解作英雄、伟人解，所以邹容《革命军》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句，那是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尊敬。柳亚子先生1945年在重庆，请人刻一章，则有“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之句，并特意嘱人刻一长篇边款：“余请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他们显然是深得其意的。清沈自南《艺林汇考》称号篇卷二引《阅耕余录》：“祢衡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虽是轻

薄之语，然所谓‘大儿’、‘小儿’者未必如今人呼子之称。如邓艾目姜维为‘雄儿’，桓温目王敦为‘可儿’盖汉魏人语如此。”

易中天先生在说到董卓打算废刘辩立刘协时，曾经找袁绍来商量，并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也就是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天行健先生指出，“刘氏种不足复遗”，不能翻译成“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遗”在这里音 wei(第四声)，是交付、给予、赠与的意思；“刘氏种不足复遗”，意思是刘氏宗族(除了刘协以外)不能把帝位再给予其他人了。

孙策在临终前将弟弟孙权托付于张昭，说了这样几句话：“若仲谋不任事者，君可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对于后面三句，易氏的翻译是：“这样，即使我们在江东不能成功，还可以设法回江西去，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作为孙策起家之地的江东竟然不如人生地疏的江西？此“江西”易氏指江北，即孙策曾招募淮泗精兵之处。黎东方先生的解释与易中天先生完全不同：“所谓‘缓步西归’，就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黎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应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妥当的。

八

盛先生《〈品三国〉商议》中还提出了几个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的问题。

比如易中天先生说：“曹操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而他做人的成功，又是知人的成功。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记载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当是事实。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之后，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等都落到了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的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曹操二话不说，下令一把火把它们烧个干净。那些暗中勾结袁绍的人，原本担心要追究的，现在又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肚子里去了，对曹操更是又佩服





又感激。”这件事是事实，没有问题。但盛先生认为，第一，这是一种权术，而且是在学刘秀的故事，第二，曹操下令销毁了那些书信，不等于真的没有检查过，《三国志·魏书·赵俨传》注引《魏略》即记载，“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李)通书疏”云云，足可为证。

又比如，易氏说详细地演绎了整篇《隆中对》，似乎对其为一篇谈话深信不疑，还说，《隆中对》是刘备与诸葛亮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不知怎么会泄漏出去的。易先生所依据的是“屏人曰”三字。而盛先生认为，实际上《三国志》中的隆中对是具备良史之才的陈寿把诸葛亮在隆中、当阳和江陵分别与刘备的对话糅进了一篇中，以显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未卜先知。人们总是以《隆中对》定格，把诸葛亮彻头彻尾神格化了。此后十余年的史事，竟全如《隆中对》所述。这其实是对《隆中对》的误识，也是对诸葛亮的误识。

还有，易先生在《品三国》上册中详细地讲述了《短歌行·对酒当歌》，将其作为“曹操能够凝聚人才，最主要的还是他爱才的真诚”的一个论据，因为诗意表明，曹操“确实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和帮手”。而盛先生却认同万绳楠先生《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一文观点，以为此诗歌为曹操于建安元年在许都招贤时，与宾客的相互酬和，全诗三十二句，每八句为一组，第一、三组是宾客的唱辞，第二、四组是曹操的答辞。也就是说，宾客唱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曹操答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宾客唱曰：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曹操答曰：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而且，曹操曾颁禁酒令，“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不应出于曹操之口。

顺便指出，易中天先生将其中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翻译为“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天行健先生说这是将“掇”当作“辍”了，这句诗应译为“你的明亮好像那天上的玉轮，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捧在手心”？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九

易中天的品史虽然有瑕疵，但他在事件的曲折铺展，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展现以及处境的淋漓尽致的描绘等方面，显然有其长处，因而也更有吸引力。在史实的考求、典章制度的阐述和地理沿革的剖析等方面，历史学家会本能地进入，并讲得比较准确。“闯入者”如能善于避开这些历史的专门问题，则不易触雷，可以扬长避短，当他们避不开时，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他们也许不了解其中还会有问题。

易氏之品史，已有多人指其小疵，这是正常之事，至于媒体渲染有人要对其进行清算，则似有炒作之嫌，天行健先生的那本“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的《清算品三国》，是平实的讲理之作。今盛公指瑕，实事求是，有益于读者，亦有益于易氏本人，指瑕或亦有过或有误，易氏本人及史家、读者、听众均可加入讨论。比如曹操写信给孙权，要他“内取子布，外杀刘备”，子布即张昭，易中天先生解释“取”为取人性命。盛公认为此“取”字可解作“听取人的意见”，颇有创意。但细读阮瑀为曹操起草的此信，下文似亦有要孙权杀张昭和刘备的意思，值得仔细研究。

黎东方解析史实、阐述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因素有研究，不易出错。但黎氏讲史亦有小疵乃至硬伤，史学界的朋友、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以及广大读者均曾多次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不断重印中，也已有所改正，但我相信此次改造配套的九大册新书，一定仍然有





值得商榷、推敲的地方。黎氏出错也是难免的，历史的包含面太广了，更何况是涵盖各个朝代的全史，他不可能每个朝代都精通。

一种文本的研读者越多，一项文化成果的受众越广，其影响自然越大，而其文本和成果的深度、精度和准确性一定也会在直面广大听众和读者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审视和检验。

无论何种著作和讲述，都是由学者和文化人独立或合作完成的。作为一个出版界中人，我一直以为精神产品的差错和瑕疵是难免的，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使我对这一观点越来越坚持。人们常常慨叹当今之出版界简直是“无错不成书”，身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抓图书出版质量不遗余力，身为编辑，我从来没有草率从事，一直坚持认认真真做书，但我还是要指出，没有一本书的作者敢于说自己的作品一点也没有差错，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众目睽睽、万耳齐闻之下的讲史和讲史著作，自然不能幸免。

易氏之书迭经央视把关、听众检验、易氏本人之反复琢磨、出版社之三审三校，尤其其下册，据报载又经咬文嚼字专家金文明等先生过目，仍不免有失，即为一例。金文明先生也是人，他在语言文字和编辑校对方面有所长，经他读过的书，差错一定可以减少，但其他诸多方面，必亦有所不逮。

盛公之书，既以易氏《品三国》为商议对象，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盛公对三国史素有研究，凡有所发，均能旁征博引，形成一则则独立而有趣的故事。在有些问题上，盛公既已为易氏指瑕，意犹未尽，索性生发开去，兼谈一些相关的知识，如“四个‘诸葛亮’”、“‘五虎将’出自关汉卿杂剧”、“关帝庙和关羽、张飞的武艺”等等均是。

《〈品三国〉商议》的价值和可读性既如上述，在盛公的一再要求下，予谨以此文为之序。